

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

主 编 李修松

作 者(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昌宜	王春芳	王鑫义	卞 利
孙以楷	汤奇学	李修松	吴春梅
余江宁	汪福宝	陆发春	张金铤
张崇旺	周怀宇	周致元	周崇云
龚来国	傅玉璋		

黄 山 书 社

前 言

淮河发源于今河南省桐柏县胎簪山,宋代以前是独流入海的。其流经的地区,据《水经·淮水注》所记:东经江夏平春县(今信阳西北)北、新息县(今息县西南)南、期思(今淮滨县东南)北;又东过原鹿(今安徽阜南)、安丰(今霍邱)东北;又东经寿春(今寿县)西北,当涂(今怀远东)、钟离(今凤阳东)二县北;又东经徐县(今江苏泗洪南)南;又东经盱眙(今泗洪东南)县故城南;又东过淮阴(今属江苏)西、北;又东至广陵淮浦(今涟水县城)入于海。《水经注》所记的淮河流经路线,反映了北魏及其以前的实情。当时淮河最大的支流泗水向北一直延伸到今山东中部,就连孔子、孟子的故乡今山东曲阜、邹城一带也属于淮河支流洙泗流域。

淮河流域曾是自然环境优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所谓“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就是对淮河流域曾有过的历史的赞颂。

上古时期,淮河流域支流密集,湖河众多,水面广阔,而且河流与沮洳藪泽相连,往往浩瀚汪洋,漫漶无际。整个淮河流域低下潮湿,淮南地区更是水乡泽国。河湖藪泽水草丰美,平原地带草莽丛生,低山台地茂林遍布,水泽之中鱼跃鳖浮,林莽地带鸟翔兽集。这里特别是鸟类栖息的天堂,以至这一带的居民自古就以鸟为图腾。淮河的“淮”,甲骨文作“隹”,就是一种鸟的象形。此后随着流域经济开发,河湖逐渐萎缩。但汉代时,孟诸泽(在今商丘、单县间)还与南方的云梦大泽相提并论;甚至直到唐代,大野泽(巨野

北)尚存南北 300 里、东西百余里的面积。

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相当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淮河流域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南召猿人(河南南召县发现)、沂源猿人(山东沂源县发现)和江淮间的和县猿人及巢湖银山人,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器物的发现,就是有力的证明。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淮河流域分布较为密集,多种文化在该流域发展和交融。除了该流域已发现的某些带有土著特色的文化遗存之外,其东北地区有山东文化区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系统,其西北地区有中原一带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系统,向南部辐射;分布在其东南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四期文化系统,其西南江淮之间的薛家岗文化系统,向北部辐射。

由于淮河流域具有多种文化交汇相融的特点,导致其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独特的地位。夏代是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第一个王朝,这个王朝的兴起和灭亡都与淮河流域有着特殊的关系。夏王朝建立前夕,夏后氏的活动中心在淮河支流汝水、颍水上游一带(禹都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境),大禹沿汝、颍二水南下治水,在今安徽怀远涂山一带“娶涂山氏女”(《尚书·益稷》),以婚姻为纽带与淮河流域的氏族结为联盟。所以禹治水成功后,才能“会诸侯于涂山”,以致前来朝会“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防风氏后至,禹杀之。“涂山之会”显然是禹树威立信的一次诸侯大会,通过此会,确立了禹在夷夏众多诸侯(多为原始部落)中的统帅地位,是诸侯臣禹的标志。所以禹死后,其子启才能够推翻传统的禅让制,代之以父子世袭制,在诸侯们的拥戴下,继承禹位称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可以说,淮河流域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如今在涂山脚下的禹墟及其附近的固镇马楼南城孜等地都发现了这个时期大面积的文化遗址,

在“禹墟”附近的怀远一带发现了多处遗址,这些当与涂山氏部落(或部落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灭亡夏朝的商族兴起于淮河流域,商汤灭夏前的都城南亳即在今河南商丘南的谷熟集,在淮北。夏王朝的亡国之君桀之所以流亡到这一带的南巢(寿县东南。一说在巢湖市境),是与南巢原是夏的联盟和亲戚之国分不开的。

据笔者考证:分布于淮河流域的徐淮夷(包括分布于淮南及江淮间的舒夷)是我国先秦时期重要古族,夏商周时期多次叱咤历史的风云,直接影响王朝的兴衰。史载,商朝灭亡的重要原因由于商末镇压东夷反抗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以至王朝内部空虚,被西方新兴的周人乘虚而入。所谓“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就是这个道理。“东夷”就是指分布于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东南地区的广大夷人。陈梦家先生根据商代甲骨文中帝乙、帝辛征人(夷)方卜辞所记载的路线考证分析认为:乙辛时期所征的“东夷”,实际上就是分布于淮河两岸的淮夷。所以可以说,淮夷的反叛,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

周王朝建立之初,武庚便联合徐淮夷等夷人迅速燃起了反抗的燎原大火,遍及广大的东南地区。摄政的周公亲率大军,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争才将这次反抗镇压下去。周穆王时,徐淮夷首领徐偃王又率东南三十六国反抗,“伐宗周,西至河上”(《后汉书·东夷传》),迫使周穆王一度“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承认徐偃王之东南盟主的地位。后来,周王朝联合南方的楚国,才镇压了这次反抗。但好景不长,周厉王时,淮夷又前后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反抗。第一次反抗时,淮夷军队深入到王朝畿内的伊洛一带,前锋直达宗周腹地上洛(陕西商县境),使周王朝遭受重创。周厉王派虢仲南伐,不克。厉王亲征,才将其压服。然而不久,南淮夷、东夷又在鄂侯驭方的率领下,举行更大规模的反抗,周厉王采取“勿遗寿幼”的三光政策,才将其击败。到周宣王时,淮夷再次反抗。周

宣王号称“中兴”，虽然征服了淮夷，但对周王朝来说不过是回光返照，不久，西周王朝就覆灭了。西周王朝的覆灭，与徐淮夷的不断反抗给王朝一次又一次沉重打击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期，由于西周以来分封于淮河流域各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西楚、东吴的扩张，淮夷的力量已大为萎缩。淮夷各国之间也矛盾重重，部族的凝聚力已大不如前。但淮夷仍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春秋前期，淮夷的武力仍能够“病杞”、“病鄆”，连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面对淮夷“病杞”事件也不得不暂避其锋锐，率领诸侯将杞国异地迁徙以求平安。直到春秋末年，淮夷还不止一次参加诸侯大会，仍然活跃于政治舞台。鲁国的季孙氏之所以能“专国政”，便是因为国内的土著淮夷支持的缘故。战国时期，淮夷的力量进一步萎缩。秦统一中国后，将淮夷“散为民户”，淮夷这个古老民族终于融入到后来的汉族之中。值得提出的是，在先秦时期，徐淮夷曾先后迁居山东、河南、安徽、陕西、河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重庆、四川等广大的地区。如果追溯中华民族的源头，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竟然有数十个姓氏源出于徐淮夷（包括舒夷）。

比起黄河流域来说，淮河流域经济在西周以前发展都是较为缓慢的。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楚文化的东进，吴文化的西拓，铁器、牛耕的使用，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交通的畅达，从而使流域经济得到加速发展。又由于淮河流域位于北方中原文化、东北齐鲁文化、西南楚文化、东南吴越文化的交汇地带，所以这个时期，该流域文化相当发达，管子、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等一系列大思想家都诞生成长于淮河流域，先秦学术流派最具影响的四大家中的儒、道、墨学派都产生于该流域，法家的思想渊源，也与该流域管子、邓析子等思想家有关，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亦为淮北（新郑）之人。

秦汉时期是淮河流域发展的重要时期，至东汉时，淮河流域已赶上（有的地方甚至超过）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成为国家重

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经济的恢复发展,使该流域人才辈出。秦汉之际的项伯(下相——今宿迁人)、张耳(大梁——今开封人)、陈余(张耳同乡)等都是该流域之人。西汉初期,不仅皇帝刘邦起于淮北的丰沛,而且诸如萧何(沛县人)、曹参(沛县人)、韩信(淮阴人)、审食基(沛县人)、彭越(昌邑——金乡西北人)、栾布(梁——商丘人)、英布(六——六安人)、卢绾(丰县人)、樊噲(沛县人)、周勃(沛县人)、王陵(沛县人)、灌婴(睢阳——商丘南部人)、酈食其(陈留高阳——杞县人)、叔孙通(薛——滕县人)、夏侯婴(沛县人)、周昌(沛县人)、申屠嘉(梁——商丘人)等都是淮河流域人。如果说,汉初的开国元勋多出于淮河流域尚与秦末农民大起义(包括刘邦这一支)爆发于楚地有关的话,那么此后该流域文人士日益增多便是与该流域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成正比了。淮南王刘安召集宾客千人,大力倡导黄老道家学术,编修黄老道家集大成著作《淮南子》,就是重要例证。至东汉,龙亢(怀远)桓氏以经学起家,自桓荣以下,五世先后为6位皇帝或太子的老师,代代为高官,门生故吏广为分布。汝颖一带名士特别众多。例如汝南的戴凭、钟兴、许慎、周举、蔡玄,颍川的张兴、丁鸿等都是著名经师或学问家。汝南袁氏四世居三公之位,门生故吏遍天下。东汉末年与宦官作斗争的士人楷模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中,汝南陈蕃列居三君,颍川李膺、荀翊、杜密列居八俊,汝南范滂、蔡衍名列八顾,颍川陈翔列名八及,35位之中汝颖名士占了1/5,可见此时流域士人之众多,文化之发达。

汉末魏初,曹魏政治集团中,由于曹氏家族起于沛国谯(亳州)地,所以其武官集团成员诸如曹仁、曹洪、许褚、夏侯惇等,多为淮河流域之人,而其文官集团中的名士则多为汝颖之人,如荀攸、荀彧、徐庶、陈群、枣祗等。还有相当多的名士,是通过荀彧等汝颖名士引荐来的。

此后,除了东晋南北朝等分裂时期,淮河流域常常居于南北政

权争夺拉锯之地带,因而经济发展受到破坏之外,隋唐、北宋时期,流域经济文化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名人学士不断涌现。隋唐大运河使淮河流域交通前所未有的畅达,因而流域商业繁荣、经济发展达到新的高峰。北宋时,都城汴梁(开封)经济文化更加繁荣昌盛。

然而,北宋以后,淮河流域经济发展延缓且遭受破坏的频次增多,这主要是由于长期的黄河夺淮所造成的。南宋初年,由于战乱连年,黄河一再溃决南流,久久得不到治理,黄河浊流夺取淮阴以下淮河河道入海,迫使淮河干流下游不得不改道经洪泽湖入江。黄河泥沙对淮河水系和流域地貌造成严重破坏。由于黄河泥沙淤积,下游入海河道逐渐变为地上河(如今在淮阴以下黄河故道形成一条高达二米至七八米高的黄土岭),遂将豫、皖、鲁、苏原属淮河流域支流的水系一分为二,将沂、沭、泗流域与淮河流域隔开。沂、沭、泗等水流因入淮无路,或淤塞或壅成湖泊,或乱流东注入海。而淮河干流自五河至洪泽湖之间的河床反被抬高,河流比降倒置,再加上河水要通过洪泽湖、高邮湖、邵伯湖辗转入江,泄洪不畅,因而易成洪灾。又由于黄水泥沙一而再再而三地长期肆虐于淮北平原,因而汉唐以来大量的水利工程、上百个湖泊被泥沙淤没,连众所周知的八百里梁山泊也被淤成平原,从而导致淮河水系调蓄洪涝干旱能力的丧失,汛期泛滥加剧,河底越来越高的黄河泛滥频次更是加多,每次泛滥,都是先淹豫东,再淹淮北。

同时,随着淮河流域人口密度的增加和农田的大量开辟,植被日益萎缩,水土流失日渐严重。围湖造田也使有限的水面进一步缩小。

近代以来至解放前夕,动荡不安的战乱和反动政府的统治使流域长期得不到治理。1938年,国民党当局炸开花园口黄河南堤,使黄河水在贾鲁河、颍河、涡河之间漫流入淮,长达9年之久,这对于本已紊乱的淮河水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大面积水体被

淤成平地,淮河中游两岸的支流也几乎没有不受黄水倒灌而淤塞的。淮河流域进一步变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老灾窝。

南宋以后,淮河流域灾荒增多,经济发展减缓。每当灾荒连年,常常匪盗四起,流民奔走,农民起义浪潮迭起。如果说,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于淮河流域,还带有秦王朝暴政,陈胜、吴广等戍卒因雨误期不得不铤而走险,以及楚人对秦的仇恨群起响应等原因的话,那么,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于淮北(因此,明初皇帝和一大批文臣武将为该流域之人),清末崛起于该流域的捻军热血奋战,便与淮河流域经济衰退密切相关。而频繁的兵燹,又使衰退中的流域经济遭受一次又一次破坏。所以治淮成为历代有识之士的努力方向,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但也由于难以治理而成为历朝统治者的心病。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努力治理淮河,5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上游干流拦蓄山洪,兴建水库;整治沿河天然湖泊洼地,建成一个又一个行蓄洪区;疏浚干支流,加固河堤,开挖新的河道……。这一切,都促使该流域工农业生产和文化事业迅速发展。

然而,50多年来的治淮也存在不足和教训。其一是重蓄轻泄,不能从根本上对淮河加以治理;其二是在“以粮为纲”口号下的毁林造田、围湖造田;其三是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水污染自净能力的减弱,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和城市废水的急剧增加,化肥、农药用量的加大,导致水质污染加剧。因此,针对淮河流域存在的问题,开辟淮河入海水道,理顺淮河水系,优化生态环境,提高对淮河水的调蓄能力以及水质的自净化能力,有效防治污染,从根本上治理淮河,已成为流域人民的共同追求。

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是指以淮河流域为范围研究其历史文化及其演变。我们不赞成所谓“淮河文化”的提法,因为淮河流域之东部、中部和西部、淮南和淮北的历史文化都是有差异的,不

构成一个独立而自成体系的文化区域。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十分广泛,除了上文提到的史前文化、文明起源、徐淮夷、楚文化、周边文化在流域的辐射和交融、学术流派与学术文化、农民起义、历史名人等外,诸如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自然环境演变及其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自然灾害与救荒、水利史、科技史、政治史、文化地理、行政区划演变、方国与古族、城市演变、人口与流民、民情风俗、方言、文学艺术、宗教史、旅游文化、古建筑、文物与考古、神话与传说、饮食文化等十分广泛,内容丰富多彩。

研究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对于总结历史经验,继承流域丰富的文化遗产,从而为今天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限于篇幅,本书仅就淮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并延及近现代的一些课题,分为十几个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以期引导读者认识淮河流域历史文化。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拓展研究领域,并不断深入,从而为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修松

2000年3月

目 录

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研究·····	(1)
淮河流域古国族考述·····	(29)
徐淮夷研究·····	(60)
淮河流域农业发展史(上)·····	(106)
淮河流域农业发展史(下)·····	(152)
淮河流域手工业发展史(上)·····	(210)
淮河流域手工业发展史(下)·····	(244)
淮河流域商业交通发展史(上)·····	(282)
淮河流域商业交通发展史(下)·····	(312)
淮河流域道家文化研究·····	(359)
淮系集团研究·····	(387)
淮河流域(安徽段)的社会变迁与流民现象(1840~1937)	
·····	(434)
淮河流域农民战争述论·····	(453)
淮河流域历史人物研究	
一、汝颖士人及其在东汉末年的流向·····	(486)
二、朱元璋与淮河流域的文臣武将·····	(507)
淮河流域文化研究	
一、《凤阳歌》歌词的历史解析·····	(520)

二、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寿县旅游文化概述	(534)
三、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亳州市文化内涵述论	(548)
辛亥时期的淮上劲旅研究.....	(565)
后记.....	(585)

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研究

一、旧石器时代人类在淮河流域的活动

淮河与古老的黄河、长江一样,是我国远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泗洪县松林庄发现森林古猿类化石,研究者将这里中新世地层中出土的古猿化石命名为双沟醉猿和江淮宽齿猿。1984年又发掘到20多枚牙齿和采集到一个带有3枚牙齿的下颌骨⁽¹⁾。这批材料是亚洲已知最古老的古猿化石,对研究古猿演化和从猿到人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淮河流域有可能是人类的诞生地,完成从猿到人的最早演化。

1. 旧石器时代早期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生活于山脉、丘陵地带,活动范围相对狭小。淮河流域上游南缘河南省南召县云阳镇附近的伏牛山南坡发现的南召猿人,化石材料为一颗猿人右下第三前臼齿,时代约为更新世中期,与北京猿人时代相当⁽²⁾。南召猿人的穴居生活可能已越过伏牛山脉,跨入淮河上游。在距离南召不远的河南临汝张湾发现旧石器地点,石器发现于张湾村半山坡上,属燕子河第四级阶地,共发现21件石器标本,其中包括刮削器2件和砍砸器3件,时代相当于早更新世⁽³⁾。在大别山附近的湖北大冶石龙头发现的旧石器早期遗址,出土80多件石制品,时代相当于北京猿人时期⁽⁴⁾。在山东沂源县骑子鞍山发现沂源猿人,出土化石计有顶骨

1件,眶上圆枕2件,部分顶骨和枕骨碎片,以及牙齿2枚,可能代表两个成年人个体,化石的形态特征与北京猿人相近⁽⁵⁾。与猿人化石同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肿骨大角鹿、李氏野猪、三门马和居氏大河狸等,这些都是中更新世常见的哺乳类化石,因之,沂源猿人所处的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这批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的发现,表明最晚在距今四五十万年以前,已有人类在淮河流域活动。原始人类为生存与自然界进行不懈的斗争,同时不断地改造人类自身。

在江淮地区发现的距今二三十万年的和县猿人,化石材料为一具完整的人类头盖骨,2块头骨碎片、1块下颌骨碎片和9颗单个牙齿,同时伴出骨角器、烧骨等文化遗物和大量动物化石⁽⁶⁾。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中国古人类的分布和早期人类的化石材料,和县猿人应是由大别山地区或山东地区的古人类南徙而来。淮河流域正是远古人类迁徙的必经之地和活动的重要场所。

2.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在淮河流域的分布比早期更广泛、更密集,人类活动遍布全流域。淮河上游有河南南召县小空山⁽⁷⁾、新蔡县诸神庙⁽⁸⁾、舞阳县大岗⁽⁹⁾、许昌灵井⁽¹⁰⁾等旧石器地点。淮河中、下游有山东新泰县乌珠台人⁽¹¹⁾、江苏泗洪县下草湾人⁽¹²⁾等古人类,有山东沂源县千人洞⁽¹³⁾,沂水县南洼洞⁽¹⁴⁾,日照县秦家官庄⁽¹⁵⁾、竹溪村⁽¹⁶⁾,郯城县黑龙潭⁽¹⁷⁾,江苏东海县大贤庄⁽¹⁸⁾,连云港市桃花涧等旧石器遗址。近年来,在淮河流域还发现大量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细石器遗存。

远古人类的活动受到自然条件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限制,他们一般都选择在离水源不太远的山地向阳坡或平缓的丘陵地带居住,主要靠采集来维持自身生存。那时,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打制的石器既简单又粗糙。根据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可知当时能够靠狩猎获得食物,但也并非易事。能够维持生活的稳定而又可

靠的生产活动就是采集。采集劳动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打、采树上果实的木棒和用来采掘、切割植物的皮、茎、果实的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这些劳动工具,除易烂、不易保存的木棒外,其余的石器,在淮河流域各期旧石器遗存中都有发现。

二、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人类古代文化与水的关系极大。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存在着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两大文化系统。淮河流域是我国五大水系之一,流域范围西起伏牛山,东临黄海,北屏黄河南堤和沂蒙山脉同黄河流域紧邻,南以大别山和皖山余脉与长江流域为界。淮河干流以北为淮北平原,以南为江淮丘陵,两岸有众多的支流汇入。考古资料表明,淮河南北两岸都是我国早期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地区。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淮河干流为中心分别向南北延伸,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衔接,自然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

通过数十年的考古研究,在人文环境方面,淮河流域东北部有山东文化区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系统,西北部有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中原(河南)龙山文化系统,东南的长江下游以南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四期文化系统,西南部有江淮之间的薛家岗文化,过大别山往西则有江汉平原地区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文化或石家河文化系统。淮河流域的先民们处在这些文化系统的包围之中,在努力创造自身文化的同时,主动或被动地接受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并在客观上起到了传递、融合南北文化的各方面因素的作用。淮河流域作为南北文化交流区之一,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表现尤为显著。南北文化的许多特征在这一地区交

互出现,互相交流、融合、升华形成了新的文化因素,培养了独具特色的淮河文化。同时确立了淮河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对流域内历史时代的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1. 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文化遗存

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文化遗存比较复杂,由于各地地理环境及文化传统不同,其文化面貌也有较大差异。目前经大规模发掘的代表性遗址有河南新郑裴李岗⁽¹⁹⁾、密县莪沟⁽²⁰⁾、山东滕县北辛⁽²¹⁾、江苏邳县大墩子⁽²²⁾、安徽濉溪石山子⁽²³⁾、定远侯家寨⁽²⁴⁾、蚌埠双墩⁽²⁵⁾等。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三个主要区域。其一是以豫中地区为中心的淮河上游地区,文化内涵主要属于裴李岗文化;其二是以鲁南、苏北为中心的淮河下游北部地区,文化内涵主要属于北辛文化;其三是淮河中下游两岸及皖北为中心的地区,文化遗存以濉溪石山子和定远侯家寨等为代表,文化内涵别具特色,为一新的文化类型。从各遗址分布的地理条件看,当时人们多选择傍湖临河的台形高地、河流的第二、三级阶地或山岭的向阳坡居住,遗址一般高出周围地表2~10米,这些遗址既便于农耕和渔猎,又能有效地防止洪水的侵袭。

裴李岗文化首次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经发掘的遗址有裴李岗、密县莪沟、临汝中山寨⁽²⁶⁾、长葛石固⁽²⁷⁾、舞阳贾湖⁽²⁸⁾等数十处。这类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是陶器以泥质红陶数量最多,夹砂红陶次之,泥质灰陶的数量最少。陶器纹饰有指甲纹、篦点纹、弧线篦纹、划纹和乳钉纹等。常见陶器有碗、钵、壶、罐、盘等。陶器的制法均为手制,大多为泥条盘筑。陶器的烧成温度达900~960℃。石器以磨制为主,磨制精致。石器器形主要有铲、斧、镰、磨盘、磨棒等。房屋均为半地穴式,以圆形为主。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都有集中的墓区。舞阳贾湖遗址还发现陶窑10余座,灰坑300多个,出土少见的带有契刻符号的龟甲和骨笛。龟甲刻符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性质。骨笛完好,全长22.2厘米,钻有7

孔,至少已具备了六声音阶,可以吹奏旋律,发音较佳。裴李岗文化是由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而来,在舞阳大岗发现其与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有直接叠压的地层关系。裴李岗文化的年代距今约 7000 年,对研究我国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开端及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北辛文化遗存经发掘的主要有山东滕县北辛、兖州王因下文化层⁽²⁹⁾、江苏邳县大墩子下层⁽³⁰⁾、连云港二涧村下层⁽³¹⁾、大村、淮安青莲岗⁽³²⁾等。经碳 14 测定,北辛文化的年代距今大约为 6700~5600 年。文化特征主要为: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以夹砂陶的数量最多,火候较低,陶质较软。泥质陶火候较高,陶质较硬。制法均为手制。主要陶器有鼎、支座、壶、钵、盘、釜、罐等。陶器的纹饰有竖直或斜行的短泥条组成的花纹带、人字形或菱形的压印纹、划纹、剔刺纹、乳钉纹等。彩陶数量很少,纹饰简单,仅在陶钵的口沿外壁绘一周红色或黑色的宽带纹。生产工具有石器和骨、角、牙器。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的石器都采用直接打击法,加工的部位主要在刃部和手握的部分,其它部分都保留砾石面;器形有石斧、敲砸器、盘状器、石铲、石刀等,其中以石斧和敲砸器的数量最多,盘状器和小型石铲次之。磨制石器有石铲、石刀、石镰、磨盘和磨棒等,其中以石铲的数量最多。石铲多为扁平长方形,器形较大,周边留有打制痕迹,制作比较粗糙。骨、角、牙器发现得很多,常见器形有镞、鱼镖、锄、凿、匕首、针、锥、梭形器等,其中以镞和针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少量的蚌铲、镰、镞等蚌制工具。

石山子和侯家寨遗存距今约 7000~6000 年,同类遗存经发掘的还有蚌埠双墩、江苏沭阳万北遗址⁽³³⁾等。这类遗存和淮河上游及下游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相同的因素,又具有自身的特点。侯家寨下层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陶器以夹粗砂及蚌末片的红褐陶为主,其次为一种外红内黑的软炭陶,还有少量的红陶和

黑陶,泥质陶很少。陶器均手制,器物胎厚而粗糙,火候低,易碎。陶器以素面为主,只有极少量的刻划纹、弦纹、附加堆纹、乳钉纹等。器形主要有盆、碗、钵形器、陶支脚、釜、筒形器、罐、鬲等。陶器流行大鼻器耳及口沿下有一对实心鋤耳,盛行花边状圈捉手器盖。生产工具发现较少,主要有石铲、石斧、陶纺轮、网坠、骨针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有大量鹿角靴形器,还发现有大型加工工具石臼。双墩遗址出土器物与侯家寨下层基本相同,突出的是双墩出土陶器底部有大量刻划符号,内容丰富,向我们提供了 6000 多年前淮河中下游地区先民们某些值得注意的信息。陶制生产工具比较发达,有纺轮、网坠、陶拍、陶杵。双墩居址呈圆形或椭圆形,为半地穴式窝棚建筑,建有木骨泥墙。

2. 大汶口文化遗存

大汶口文化首先于 1959 年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发现,故名。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已逾百处。它们集中分布在鲁中南及东南丘陵地区和江苏淮北一带。在皖北、淮河上游的河南境内也发现了一些大汶口文化遗址或包含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原始文化遗存。大汶口文化是由北辛文化发展而来。一般认为,鲁中南和江苏淮北地区为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安徽淮北和河南东部存在大汶口文化新的地域类型。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文化渊源造成的。河南境内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均有分布,但逾往东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逾大,显示了这一时期大汶口文化的强劲势头。总的看来,大汶口文化占据和影响了整个淮河流域。

经过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有山东泰安大汶口⁽³⁴⁾、滕县岗上村⁽³⁵⁾、邹县野店⁽³⁶⁾、泗水尹家城⁽³⁷⁾、曲阜西夏侯⁽³⁸⁾、日照东海峪⁽³⁹⁾、临沂大范庄⁽⁴⁰⁾、兖州王因、江苏邳县刘林⁽⁴¹⁾、大墩子、新沂花厅⁽⁴²⁾、安徽萧县花家寺⁽⁴³⁾、亳县富庄⁽⁴⁴⁾、蒙城尉迟寺⁽⁴⁵⁾、宿县小山口、古台寺和芦城子⁽⁴⁶⁾、灵璧玉石山⁽⁴⁷⁾、河南禹县谷水河⁽⁴⁸⁾、平顶山寺岗⁽⁴⁹⁾、鹿邑栎台⁽⁵⁰⁾、郸城段寨⁽⁵¹⁾等数十处。大汶